



买办文人胡适評《水滸》

(供批判用)



7.41

安徽劳动大学图书馆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

目 录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1)

胡适思想批判论文中有关《水浒》部份文摘
.....(2)

《水浒传》考证(20)

《水浒传》后考(63)

《水浒续集两种》序(88)

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104)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论述摘录)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

《水浒》中的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终于成了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水浒》的作者竭力美化和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

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

《水浒》问世以来，它的主要倾向是什么，一直众说纷云。解放以后，曾被有些人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甚至把宋江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投降主义路线，也说成是无可非议的“农民的局限性”，并把这种观点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实，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把宋江这个投降派说成是革命派，把歌颂宋江的修正主义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混为一谈，这样的重大问题，难道不需要彻底弄清楚吗？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原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

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农民的局限性”。于是，投降派变成了英雄，农民起义的结果必然走向投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统统被抹煞了。请问：斗争不屈而失败，同宋江为追求“官爵升迁”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往往陷于失败，但投降绝不是它的必然结果。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

这里，重温一下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毛主席说，象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这些深刻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肃清《水浒》研究中的阶级

调和论的流毒，是完全适用的。《水浒》这部小说中的宋江，同《武训传》中的武训是一丘之貉。歌颂叛徒宋江，同歌颂奴才武训，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

在当前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运动中，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揭露《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划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摘自《人民日报》社论《红旗》杂志
短评等有关评《水浒》的文章）

胡适思想批判论文中有关 《水浒》部份文摘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说他要“贡献”给大家一个“根本的文学观念——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他说这个观念就是：“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

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他把这个观念又用到研究历史方面去，叫做“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他说：“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

胡适是很喜欢宣传他这个“根本观念”或“根本方法”的。他在“实验主义中说实验主义有两个“根本观念”，第一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他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也说实验主义的方法，“公开来可作两步说”，第一叫做“历史的方法”，第二叫做“实验的方法”。

必须揭穿他的欺骗。必须指出，他所夸耀的这个“根本观念”或“根本方法”不是别的，正是一种宣传唯心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形式。正是在这种好象很客观的“历史的态度”或“历史的方法”之下，他到处出卖他的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

还是让我们来看他的“水浒传考证”吧。从他的这个方法的具体应用中来看它的实质吧。关于“水浒”故事的来源，他先抄了三条“宋史”上的记载，然后说：“这三条史料可以证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历史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盗”。前半句是对的。但这种查查书就可以发现的“真理”，不能算作实用主义的方法的贡献。而且，这种“真理”是和实用主义不两立的。实用主义不是说：“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都必须用“实验”来证明吗？“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历史的人物”，这是永远无法用“实验”来证明的。那么，不是这一条知识根本靠不住，就是实用主义的真理是胡说了。但问题还在下半句。“是北宋末年的大盗”，这不是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家的口吻一样吗？而且，既然不过是“大盗”，那是活该身殒名灭的，为什么又流传成为“水浒”故事呢？在这里，胡适就用上了他的实用主义式的解释了，实行了他说的“尽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他说：

“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看这些话可见宋江等在当时的威名。这种威名传播远近，留传在民间，越传越神奇，遂成一种‘梁山泊神话’。”但是，为什么三十六个“大盗”，“官军”数万都不敢抵抗，而且“威名”传播远近，流传民间呢？可见胡适鼓吹得天花乱坠的实用主义的“历史的方法”实际是连这样一个事实也不能说明的。

对于宋江等人的故事的流传久远，胡适除了用说了等于不说的“威名”来解释而外，还列举了这样一些原因：“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

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文存”一集卷三92页）。他引龚圣与和周密的话来证明他的看法。胡适的这种解释是更加反动的。他用民族矛盾来抹杀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而且宣传了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按照他这种说法，如果没有异族统治，“水浒”故事就不会流传下来了。照按他这种说法，如果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能够做到类似他所主张的那种“好人政府”，宋江等人也不会被人民所崇拜了。龚圣与和周密的封建主义的立场是很鲜明的。周密以鄙视的口吻说宋江等人不过“盗群之靡”，龚圣与肯定宋江之处，不过是说他“立号既不僭侈”，“不假称王”。胡适用这样两个人的看法来全部代替了当时人民群众对宋江等人的看法，这是一种欺骗的手法，也是一种可恶的武断。

胡适不但用龚圣与和周密这样两个人的看法来代替当时人民群众的看法，而且用它来抹杀了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本来具有的正义性和人民性。他叙述了一阵元曲中的“水浒”戏之后，因为那些戏里写出了梁山泊好汉们是“替天行道救生民”，称宋江为“及时雨”，他就又妄为加上他的实用主义的解释了。他说，“梁山泊强盗渐渐变成了‘仁义’的英雄”，这是到了元朝才开始有的。他说，“这一变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给梁山泊，这是水浒故事的一大变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间的心理，又暗中规定了后来‘水浒传’的性质。”（同上，106页）这些话都是非常反动的。他这是既否定了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本来具有的为广大人民所拥护的正义的性质，又否定了“水浒传”这样一部伟大作品的现实主义的基础。按照他这种说法，宋江等人领导的农民起

义农民战争本来是並不“仁义”的，并不为广大人民所拥护的，不过是在元朝的异族压迫之下，人民无可奈何，只有把过去的“强盗”幻想为“‘仁义’的英雄”。按照他这种说法，“水浒传”把宋江等人写得深得民心，这也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不过是受了上面所说的那种可怜的幻想的影响罢了。胡适这样武断的根据是什么呢？也是因为龚圣与只是呼宋江等人为“盗”，只是肯定他们“立号既不僭侈”，并没有说他们“仁义”，並沒有说他们“替天行道救生民”。这也是实用主义的一种“方法”，凡是什么事情都要见于文字记载以后才算它开始存在。……

下面胡适就开始考证“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做的，以及它的版本了。更是毫无根据，只凭一些“大概”、“我以为”、“我们可以假设”之类的说法，就断定了“施耐庵”是一个“假托的名字”，而且“他决不是明朝初年的人”，只能生于“明朝中叶”；就断定了金圣叹“确有一种七十回的‘水浒’本子”，替他假托古本来腰断并窜改“水浒”园谎。这种考据上的主观武断是和他对于“水浒”故事的意义的任意歪曲同样荒谬的。

胡适对“水浒”故事的意义和“水浒传”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作了以上所说的根本歪曲之后，却依然装着十分客观的样子说：“至于见解和理想一方面，我本不愿意说话，因为我主张让读者自己虚心去看‘水浒传’，不必先怀着一些主观的成见。”然而，刚说完以后，就自己打自己的咀，又宣传他的对于“水浒”的总看法了：

圣叹最爱谈“作史笔法”，他却不幸没有历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自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愿的地方，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

他们的宿愿，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他发挥宿愿，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他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愿，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文存”一集卷三，142页）。

这个总看法露骨地表现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反动。这就是说，“水浒”故事本来是没有固定意义的，是完全可以由人任意解释的；文学作品也是不必正确地反映现实的，是谁爱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的。这正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具体应用。他在“实用主义”中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因此古来的哲学家可以随便乱说”，而且“你和我都不能断定那一个说的是，那一个说的不是，只好由他们乱说罢了”。因此，他主张：“我们现在且莫问那绝对究竟的真理，只须问我们在这个时候，遇着这个境地，应该怎样对付他：这种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便是‘这个真理’。”这就是说，只要对于说的人有用，“随便乱说”都是真理。胡适的这种“随便乱说”当然是有用的，这可以抹杀历史上的阶级对立，否定农民革命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性，掩盖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农民的反抗的残酷的镇压，并且一笔勾销了文学的生命——现实主义。

胡适的“历史的方法”的用处还不止于此。他还要用它来为金圣叹和俞仲华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作辩护。他说，他们深恶宋江等人，不过是因为“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候，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俞仲华生当嘉庆道光的时代，洪秀全虽未起来，盗贼已遍地皆是，故他认定‘既是忠义便不做强盗，既做强盗必不算忠义’的宗旨，

做成他的‘结水浒传’——即荡寇志——要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辩，丝毫不容假借！’”（同上，142、143页）这就是说，他们反对农民起义，也是对的，也是真理。

这就是胡适大吹特吹的“历史的态度”、“历史的方法”、“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的内容。这就是他所说的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的真面目。……他所说的“历史的方法”原来正是反历史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

我们应该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评价过去的人物和作品，但这绝不是我们对于过去的人物和作品就一律不加区别，就不能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不能按照我们的立场、观点来加以批判。“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但难道这些不同的文学见解没有正确和错误的区别吗？这些不同的文学作物没有进步和落后、好和坏的区别吗？难道从这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文学作物里面看不出阶级性的差别吗？我们不能要求古代的作家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描写得和今天的革命作家一样正确，我们也不能要求古代的文学批评家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家一样科学地分析作品，但我们绝不能容许把“水浒传”和“荡寇志”看成一样，绝不能容许用龚圣与和周密的眼光来代表当时的人民群众的看法，也绝不能容许用历史条件来为金圣叹和俞仲华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辩护。对于金圣叹，应该承认他在文学见解上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但必须指出，他反对农民起义的根本立场是反动的。

……他还对象连绵不断的高峰一样矗立在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杰出的作家和作品，差不多一个一个地都加以贬低或歪曲。……他说“元人的文学程度实在幼稚”，“即如关汉卿、马致远两位最大的元代文豪，他们的文学技术与文学意境都脱不了‘幼稚’的批评”（“水浒传考证”）。……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把“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都列入“非人的文学”之内，胡适大为赞赏。他说，“我们一面夸赞这些旧小说的文学工具（白话），一面也不能不承认它们的思想内容实在不高明，够不上‘人的文学’。”（“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30页）……至于他对“红楼梦”的贬低和歪曲，那更是人所共知，不必说明了。

（摘自：何其芳：《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

见《人民文学》一九五五年五月号）

胡适对于他抹煞不掉而不得不表面加以肯定的作品，便极力贬低（实际等于抹煞）其价值。……他说“水浒”是“东凑一块，西补一块”，是“文学技术很有限”的作品，……。

（摘自余冠英：《胡适对中国文学史“公例”的歪曲捏造及其影响》见《胡适思想批判》1959年版）

他（胡适）的文学史和有关研究古典文学的文章中就充满了这些主观主义的考证，并据以抹杀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宣扬他的反动的唯心论观点。他也说过什么“不懂得明末清初的

历史，便不懂得雁宕山樵的《水浒后传》。不懂得嘉庆道光的遍地匪乱，便不懂得俞仲华的《荡寇志》，——这叫做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水浒传考证》）他不管这些作品的内容是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只企图笼统地用时代来解释，好象一个时代就只能有一种内容的作品；那么为什么在同样的他所谓“遍地匪（！）乱”的南宋就会产生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而并不产生《荡寇志》呢？这就不能不证明他这种理论的破产了。

（摘自王瑶：《辟胡适的所谓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见《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1956年版）

因为自然主义反对作品中有倾向性和思想性，他们以为作家的的工作只在陈述，……

现实主义文学明确地认为文学作品的本身一定包含着作家对生活的评价和判断，决定它反映了那一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有脱离了阶级利益的文学思想。因此进步的文学必须保卫人民的利益，必须公开地和进步阶级联系起来，使作品带有鲜明的倾向性；……这是评价作品的重要尺度。只有力图掩饰社会矛盾、企图迷惑人民群众离开斗争的资产阶级文学思想，才用种种方法来掩饰作品中的倾向性；因此自然主义在帝国主义的文化腐朽时代的资产阶级文学中最为流行。胡适就是窃取了这种反动的自然主义思想，来对我们的许多文学作品进行歪曲的。……他不满意“官场现形记”的作者对封建官僚的丑恶现象怀有强烈的憎恨，而要求对这些官僚有“哀矜”和“同情”，以便使读者

的憎恨在“开口一笑”中化为乌有，这就是胡适反对文学的鲜明的倾向性的实质。……他以为文学作品中最重要并不是他的思想内容，而只是什么“诙谐的风趣”；……其实这种企图歪曲文学作品内容的思想，正十足地表现了胡适自己的鲜明的倾向性，忠实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咀脸。鲁迅先生曾指出金圣叹批小说戏曲的结果是“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而且那客观效果，只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而胡适却认为金圣叹的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因为他“很明显地教人知道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而且特别欣赏金圣叹给他儿子看“水浒传”所说的话：“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汝手。”（《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胡适也从这里吸取了“经验”，知道用禁止阅读的办法对于那些富有人民性和艺术魔力的古典作品是无效的，最好还是用曲解的办法；但他比金圣叹“进步”多了，不再用“批释法”，而用的是实用主义的考证和自然主义的批评；但那把古典作品“化为笑谈”的卑劣企图却还是一脉相承的。

（摘自王瑶：《批判胡适的反动文学思想——形式主义与自然主义》见《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1956年版）

胡适的主观唯心论的实用主义，应用在古典文学研究上，最明显的是用形式主义的观点来了解过去的文学，并且把过去文学发展的历史说成只是形式演变的历史。除此以外，他又对于一些作品的作者和版本做了许多繁琐的其中许

多是牵强附会的考证。他自己说他做这种考证的目的，“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又说他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这就是说，他写那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主要是为了向读者灌输他的实用主义的方法。有时他宣称是不谈作品的内容的，他在“水浒传考证”里说他“只从文学的技术上着想，至于见解和理想一方面，我本不愿多说话，主张让读者自己虚心去读‘水浒传’，不必先怀着一些主观的成见。”但是，胡适对于古典文学作品，包括对于“水浒传”，真的不去谈他的“见解”和“理想”吗？胡适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只限于“著者”和“本子”方面吗？不是这样的。胡适很懂得“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并且说：

“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他是理会到文化与政治是不能分开的。他尤其明白，要宣传他的反动思想，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政权效力，文学是很能收“效果”的东西。所以他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不光是用形式主义的观点来了解文学，不光是用“赫胥黎和杜威的思想方法”来考证著者和版本，另外一方面，他通过一些考据文章和其他论著来发挥他的荒谬绝伦的“见解”，来歪曲作品的内容，因此他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使进步的反封建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失去它的教育意义，而反动的无聊的作品，毒素可以传播出来。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是不可分的，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它的社会内容，胡适在歪曲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时候，就必然要歪曲文学和社会的关系。

胡适对于许多古典文学作品，都是讲到了它们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例如他在“水浒传考证”里谈了“水浒”的“理想”和“见解”；……

他说他是不谈“水浒”的“见解”与“理想”的，但他还是谈了。他说“‘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的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从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他发挥他们的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他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他认为这是“水浒”的“见解”和“理想”。他把“见解”和“理想”称作作者的“一肚皮的宿怨”，可见他对“见解”和“理想”是怎样的看法。这还不说。我们只来看他这段话是怎样荒谬，把这段意思说成“水浒”的“见解”和“理想”，是对“水浒”的极大的诬蔑！这里胡适大谈“水浒”故事的时代背景，认为因不同的时代的影响，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认为“水浒”根据宋江故事写梁山泊英雄“替天行道”，是反映了宋元的社会情形，代表了宋元人的“见解”；认为“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是反映了明初朱元璋大诛功臣的历史背景，代表了明初人的“见解”等等。如果不加思索、粗粗地看去，好象胡适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似的。我们研究文学作品，不是要结合它的时代背景来分析吗？胡适是那样具体地结合时代背景来谈“水浒”，这还能是他的错吗？

但是，这完全是胡适的胡说：“水浒”的故事，固然是